

國際恩友話鮑叔 —民國史的缺頁

史述

“鮑羅廷”可能是孫文(逸仙)先生賜的譯名，相信其中文必然很有講究。“鮑”，取自重義輕財的鮑叔牙；“羅”，是俄羅斯；“廷”，是朝廷，政治，不過，孫先生有意或無心，會寫成家庭的“庭”，意思自然是一家人。在其人一生對華關係上，也確當之無愧。

孫逸仙(1866-1925)比鮑羅廷大了一代，所以稱之為“拉法葉”，隱然自比華盛頓，以中國國父自居；鮑羅廷則是為華盛頓參謀，對美國獨立革命有莫大貢獻的法國人。可謂取喻洽當。

鮑羅廷(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, 1884-1951)是猶太裔俄人，原名為 Mikhail Gruzenberg，在美國芝加哥的時期，用 Grosenberg，在墨西哥用 Brantwein。他與列寧相識，精通英語，早就知道“孫逸仙”。

孫逸仙對異邦同志真誠相託，是政客少有的天真，並不表示對方的想法也是如此。但那時他沒有自己的武力，綜觀不服從政治領導的中國北方軍閥和南方軍閥，又有幾個是可以相信的？

1919年，孫的岳父宋嘉澍(耀如，即查理宋)逝世，對美援的希望，也更加黯淡。在那時期，列寧於1917年革命成功，推翻了沙皇統治，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政權。恨滿清積弱，又厭軍閥爭鬥的中國青年，對蘇俄非常嚮往。1920年，陳獨秀，李大釗，張國燾等人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，並於1921年七月二十三日，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。

孫在那時，得道而不多助，似已經走到了窮途。呆在上海，實在是意在孔子的“沽之哉”，可惜，知音者少。英美方面，道義援助也好，政治投資也好，都成了“溪水流乾的河道”。遙望北方，蘇俄崛起，成立“第三國際”，他的心存有希冀。他清楚知道，那強鄰不是好相與的；不過，哪有其他的途徑呢？

1921年，有個荷蘭人馬林(Maring)找上門來。其人通曉華語，是蘇俄外交部代表，他認為蘇俄雖然與正統的北方政府有外交關係，卻也不妨與南方的孫中山交往。以後，馬林在華三年，繼續推動國共合作，並曾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。

1922年，孫在演講中放話：“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，就是共產主義”。幾乎是如響斯應，列寧派遣來的代表越飛(Adolf Joffe)，踏上了“門前冷落車馬稀”的孫府。

1923年一月，孫與越飛發表聯合宣言。宣言內容：蘇俄模式的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，蘇俄取消其華特權，蘇俄對外蒙沒有野心，並促成國共合作。

當時，雖有具雛型的中國共產黨，但為首的陳獨秀，只是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(文學院長)，其他主要人物，也都是有理想，有壯志，而乏實力的文人，所以對列寧而言，認為孫是較明智的選擇。

1923年二月，孫逸仙有蘇俄的諾言，昂然的再返廣東，又一次自任為大元帥。但這次不一樣了，因為他取得有力的後援。

同年十月六日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率團抵達廣東，獲得孫中山的信任，不到一星期，委為特別顧問。孫對鮑幾乎言聽計從。

用印有“大元帥令”的信箋，孫親用毛筆鄭重寫道：

聘任鮑羅廷為革命委員會顧問遇本會長缺席時得有表決權。此狀。

會長 孫文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一日

在孫的周圍，有一批人，是：宋慶齡，廖仲愷，陳友仁，孫科，宋子文等人，他們以 Uncle Borodin 為中心，時常以英文交談。明顯的，只是為了共同語言的方便，但在別有居心的人看來，是在“密謀”；就把他們視為“國際派”，被部分軍閥流氓形成的“本土派”，當作眼中釘。而廖仲愷，儼然有成為繼承人的可能，引起野心分子嫉妒，成為他致禍之因，後來終被暗殺，死的不明不白。這是國民黨自己人暗殺施於同志，可恥行動的首例。有人傳佈是胡漢民所為；其實，胡深明大體，是有高度的學養的正人君子，說他會幹那種卑鄙下流的惡事，知道的人難以相信；只有軍閥流氓，私爭叛黨者才會，當然主使者另有其人。

鮑叔之所以為鮑叔，因為他帶來蘇俄的大筆援助六百萬盧布，當時約為美金二百萬元，雖然是來自第三國際，但他敬佩孫中山，顯出是雪中送炭的朋友。

鮑羅廷根據實際革命經驗，洞察國民黨的連番失敗，弱點在於太弱，組織既不堅強，又沒有自己的革命武力，只憑理論難以成事。為此，他建議必須改組中過國民黨，仿照蘇聯體制；並建立軍事學校，訓練幹部。

孫採納鮑羅廷的建議，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。有人耽心那將被蘇維埃化了，勸阻他；他說：果如此，他將選擇加入共產黨。可見孫當時態度的誠懇堅決。

至於軍校，由誰負責呢？鮑與黨內資深同志，屬意青年俊彥鄧演達；孫則記得徐樹錚慧眼識英雄，推薦過蔣介石。大家都同意的，是蔣學歷不足，日本士官未畢業；論軍職，只任過下中級幹部，不孚眾望。為了補救這些缺點，鮑羅廷對蔣加以提拔，介紹蔣往蘇俄考察四個月，學習軍事建構及戰略運作。這在 1923 年成為事實。

1924年，黃埔軍官學校開創了，由蘇俄歸國的蔣介石，擢升少將膺任校長，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。至此孫和黨才真有自己的軍隊。學校的訓練，以愛國及三民主義為基礎；軍隊規制及裝備，都是來自蘇聯。首幾期的學生，頗不乏來自各地的有志之士，但程度參差不齊，大部分未經充分訓練，即應急參加北伐行列。

在此以前，孫只是拉攏雲南，廣西，廣東軍閥的地方軍隊，他們不受“外人”指揮，連有“大元帥”崇高銜頭的孫中山，也無可奈何。

國民政府經費有了著落，才像個真正政府。鮑羅廷的代表團，人數增至五十八人，影響力極為顯然。加倫將軍為首席軍事顧問，護衛長。加倫是蘇聯革命戰爭英雄 Vasily Blyukher 的化名(1889-1938)，實際軍階是上校。其人深思遠慮，謀略過人，他說：能以訓練裝備精良的四師軍隊，橫掃中國，並非徒作壯語。

1924年一月，列寧崩逝。對中國援助，在既定政策下，並沒有顯著改變，援助源源而來。當時，主持軍事的，是托洛斯基(Leon Trotsky)，與鮑羅廷同為猶太裔，可能多少有些關係；但蘇俄選擇施惠的對象，是對它友好，又有組織的實力者，可以為其敵擋所忌憚的日本。這個宗旨，一直維持。

1924年十一月，廣東安定發展，看來孫中山又像是中國重要的政治領袖了。當時，北方之雄的執政段祺瑞，邀請孫至北京共商國是。同行者有宋慶齡夫人，汪精衛及鮑羅廷等人。可見孫鮑關係的深厚。留胡漢民守家，代理大元帥。

1925年二月，孫發現患有肝癌；醫藥罔效，於三月十二日，逝世於北京協和醫院，得年僅五十九歲。

在病榻垂危的時候，得到使他欣慰的消息：蔣介石率領的軍隊，克復了孫首次起義的惠州，再下汕頭，把陳炯明逐出廣東境外；可見俄國的援助，加上加倫將軍的策略，這麼快就已經有效的運作。在“總理遺囑”，中“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”一語，有所特指了。據云：遺囑出自國民黨英才汪精衛手筆，那時他親俄。其實，作如此想的，不止他一人。是到後來宋慶齡有較長時間客居蘇聯，同陳友仁去俄國劇院，看到辱華的演出，才廢然憬悟，知道“平等待我”只是一廂情願的存在。

1926年七月九日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誓師北伐。當時號稱有85,000人雄師，其中黃埔軍校約八千子弟，國共兩黨混合，有廣東，雲南，湖南的軍隊，聲勢之壯，是國民黨前所未有的。至於說到軍費及裝備，自然是來自蘇聯，還有繼續經加倫將軍請得的援助。

後來，我查問軍校畢業生，他們晚至十期，採用德國式操典，仍然是俄式武器裝備。一直到對日抗戰初期，仍然使用蘇製槍炮，機槍，以至坦克，飛機，以對抗日軍。

北伐軍連戰連捷：克長沙，武漢後，鮑羅廷抵達，獲得三十萬群眾夾道歡迎，是眾所注目中心的英雄，仿佛是鮑羅廷的北伐。那是他最風光的

時期。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。鮑羅廷主導的戰略，是循京漢北上，直趨北京。倘若如此，中國局勢早定。蔣介石特地親至武漢，參與會議，堅持先取南京，上海。他認為那裡青紅幫的勢力較大，可以應援；實際上是短視著意割據，不幸，那正是洪楊太平天國失敗的路線。他似是有些畏懼北方，這意念一直纏繞他；到中日戰爭結束，國民參政會通過還都北京，還是遭受他固執的否決。

民國人物的作風，是有兵權的決定政治。只不過在三年前，蔣要晉見胡漢民，得央人先容；現在，胡代主席形同無物。不論會議意見如何，蔣獨排眾議，率軍沿長江東進，於1927年春，攻佔了南京，上海，宣佈定都南京，造成寧漢分立的局面。

至於國共的合作，好景不長，因為從開始就不是水乳交融，而是油水混合並存。先是孫屍骨未寒，“西山會議派”即宣言開除共產分子黨籍；繼而有人在廣州借端製造衝突。至此，蔣於四月間，發動清黨，排除一切跨黨親共者。鮑羅廷前曾以馮玉祥為人平民化，屬意馮為領導人，也不會是蔣所樂見的。那時，蘇聯共黨的內爭，已經塵埃落定，托洛斯基出亡，史達林勝出，統御一切政府權力。六月間，發現史達林電報，指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力，導致國民政府同蘇聯絕交。而寧漢分立的局面，到了1928年，因形勢所趨，武漢政府以讓步而結束，蔣大權獨攬，當上了主席，繼續北伐。北方軍閥分歧散漫，難以抗爭，中國形式上統一了。

鮑羅廷進退失據，於1927年八月遭逐，還是馮玉祥念舊，安排他經蒙古返國。返蘇聯後，鮑羅廷未受重用，僅因其英文長才，作些工作；但他的政略遠見，仍被遵循；他建立的人緣，也仍然維持。延至近十年後，1936年十二月，發生“西安事變”，張學良，楊虎城軍劫持蔣介石，進行所謂“兵諫”，有人主張殺之以洩恨；但張國燾，周恩來等，力主電史達林請示，所獲復示是予以釋放。這也可能視為鮑羅廷原則的延伸。

鮑羅廷對於孫逸仙的政治見解，似是相當認同，在逝世之後，鮑羅廷與宋慶齡聯袂赴俄，奔波籌建孫逸仙大學，不能不解釋為個人的景仰，超越政治上互相利用的範疇。

總結來說，鮑羅廷對國共雙方有存國之功，對蔣直接有提拔之德，間接有救命之恩，是民國史上的關鍵人物。

蓋棺定論，多數學者認為孫逸仙的成就，不在於其政治理論，不在於其縱橫闢闔，雄才大略，而在於其特有吸引人的性格，仁厚而氣度恢宏，對人寬容。雖然孫未親見其政治理想的成功，也不能算是傑出的聖徒，但在天性以外，其早期所受基督教信仰的型鑄，不會沒有原因。這為中國革命的先鋒，不用詭詐欺騙的手段，在中國複雜的近代史上，可算奇蹟。

史家曲拯民先生，於數年致函中國大陸與台灣當局，提議建館立碑，以紀念鮑羅廷，但都沒有反應。歷史的這一頁，似乎悄然失落。也許，對於人的恩德，中國人已經失去記憶的能力，也不復是固有的風尚了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